

乡村振兴赋能 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

□ 刘 萍 李 林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国家基层治理确立了宏观坐标,民族地区依靠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生态在该进程中拥有特殊地位。部分偏远乡村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依旧遭遇人口结构失衡所引发的主体匮乏与旧有的管理模式滞后等现实阻碍,致使基层事务运作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本文依据客观发展现状,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培育本土特色产业和运用数字技术等方面给出具体改进建议,以期为解决社会矛盾、合理配置资源提供有用的现代治理发展思路。

直面治理困境 破解发展瓶颈

基层治理主体参与意愿与协同效能不足。城镇化进程持续向前推进,大量拥有较强劳动能力和文化素养的青壮年人口向中心城市迁移,乡村常住人口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和空心化特点。留守群体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的制约,通常会把主要精力用于农业生产和家庭事务,对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空间维护等集体事务的关注程度较低。人口流失减少了乡村自治的内生力量,村级重大决策难以集中民智。基层多方力量参与方式还不够健全,外来社会组织和民间资本在进入乡村公共服务时,经常会遇到较高的沟通成本和投资风险。基层治理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单一行政力量进行推进,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缺少高效的畅通协作网络,从而使整体协同运作效能无法达到现代公共管理所提出的高标准与严要求。

□ 郭 鹏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設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将文化数字化从全局政策层级上升为关乎城市发展范式的全局性命题。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的创意阶层理论认为:“创意阶层的崛起正在重塑城市竞争的底层逻辑。”在城市转型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的数字化重构正由辅助性产业向核心领域转变,从单一产业形态上升为城乡治理与发展的重要议题。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视域审视这一转型不难发现,当数字技术深入融入文化资源开发全链条,城市的文化形象早已不是点缀,而是重组生产要素、重构治理逻辑、重塑空间价值的战略性变量。

四川省遂宁市的实践具有样本价值。在资源禀赋不具备显著优势的情况下,内陆中小城市如何从文化开发入手实现发展能级突破?本文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旨在为更广泛的城市转型实践提供理论参照。

时代方位:软硬协同重构城市竞争逻辑

理解遂宁样本的理论价值,需要将其置于中国城市发展逻辑整体性变迁的大尺度中考量。

一是,城市竞争格局正由“硬实力主导”向“软硬协同赋能”转变。随着新发展格局的持续深化,城市对高端流动性资源

偏远区域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供需失衡。社会治理的高质量推进需要完备的硬件设施和充足的公共资源给予支撑,但民族地区受地形地貌复杂多变的限制,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后期维护成本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部分偏远村庄的公共文化场所和数字网络覆盖范围仍然较小,旧的单向信息输送形式使居民无法及时、准确得到政策消息。在产业资源利用上,由于劳动力短缺制约,大量零散分布的农用地没有实现规模化集中开发,土地闲置现象间接削弱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基础。教育和医疗等关键公共服务资源不仅面临总量供给相对不足的制约,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供需错配问题,这种失衡加剧了区域发展差距,致使乡村基层难以有效吸引并留住专业技术人才。加之缺乏具备现代治理理念的骨干团队支撑,各类惠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难以精准对接民众多样化、动态化的实际需求,导致服务供给与群众期盼出现“错位”。这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脱节,制约了区域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也制约了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资源配置失衡 供需对接错位

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多元共治新格局。提高基层事务管理效能的核心是加强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各级各部门应具有良好政治素质和开拓创新意识的人才充实到村级领导班子中,发挥党员干部在纠纷调解和政策落实中的先锋引领作用。贵州省榕江县依靠建立县镇村三级联动网络,将党员培养成产业带头人,并且扩大党

群议事渠道,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动力。基层应建立公开透明的议事协商平台,完善网格化管理模式,明确网格员在信息采集、服务代办等方面的具体职责。村级的规划决策应当广泛吸纳返乡创业青年、德高望重的乡贤群体参与,并且畅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渠道。完善政务公开和民主监督方式可以切实保障村民的知情权,进而建立起决策共商且治理成果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依托特色产业赋能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将产业振兴与治理效能提升结合起来是实现乡村良好运转的物质基础。地方部门应当依据当地土壤气候和自然禀赋,积极培育具有高附加值的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同时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农业和加工业深度融合。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创造出很多就业和就近的就业机会,吸引外出工作的劳动者回到家乡居住,从而在源头增加乡村自治所需的人才储备。发展村集体经济既可以将村庄人居环境治理好,也可以为公共文化服务、帮助弱势群体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在推进产业规模化的进程中,大力推广企业联合农户的互助模式,健全风险共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切实保障农户的合法收益。将民族地区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入文旅项目进行深度开发,形成集观光和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产业链,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经济效益,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稳定的经济和物质保障。

融合民族文化与数字技术提升精细化服务。将数字化转型与文化传承相结合,是破除偏远地区信息壁垒的重要方式。增加对民族地区通信基站的资金投入,消除

网络覆盖盲区,可以给智慧乡村建设提供必要的硬件基础。将多部门政务数据资源整合起来开发乡村综合服务客户端,把户籍办理和惠农补贴申请向移动端延伸,通过数据共享提高办事效率。云南怒江州依托数字平台赋能农技普法,融入法治实践,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矛盾调解品牌,推动纠纷治理由被动处置向源头预防转变。现代数字媒介通过广泛传播优秀乡土文化,不仅提升了村民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更引导他们以现代文明理念重塑人际交往规则,进而为和谐有序的乡村新秩序提供坚实的精神动力。

融合数字科技 传承民族文化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是关乎基层长治久安与繁荣进步的系统性工程。夯实经济根基与数字赋能构成了关键支撑,二者协同推动管理模式迭代升级,有效破解治理主体薄弱与资源配置失衡难题。坚持党建引领,深化特色产业培育并促进优秀民族文化与治理机制深度融合,必将激发出乡村社会磅礴的内生动力,推动基层治理迈向科学协同、高效有序的新阶段,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刘萍系云南开放大学副教授;李林系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主治医生;本文系2025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智库项目《云南边疆乡村社区“一老一小”社会工作机制创新研究》(编号:ZK2025YB47)阶段性研究成果;2025年云南开放大学课题《人口老龄化背景基层治理与社区服务协同创新机制研究》(编号:2025G22)成果】

义,远大于具体项目层面的技术移植。

二是,整体性治理是破解“条块分割”的制度密钥。依托文化数字化的跨界属性,遂宁实践逐步建立起跨部门协同的制度运作机制,从“部门分割”走向“整体治理”。更具制度创新意义的是“川渝协同”维度的嵌入:与重庆潼南等地图书馆共建共享、联合策展、互通读者,将文化数字化嵌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制度框架,这种“以文化协作促区域协同”的路径,为跨行政区划的文化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

三是,包容性治理是激活社会创造力的制度底座。遂宁实践的前瞻性体现在多元主体协同的文化治理结构上,将文化发展权从单一主体适度让渡、有序释放,承认民间力量是城市文化生产的重要参与者,承认小众社群是城市文化多样性的活态载体,承认试错成本是培育新兴业态的必要投资。这种治理哲学的转变,比任何具体项目的落地都更具深远的改革意义。

遂宁样本的深层启示,需要放在更宏阔的改革叙事中加以理解。当中国城市化进入“下半场”,城市发展正面临一次根本性的价值重估,这不仅是发展模式的调整,更是城市发展哲学的重构,城市不再仅仅被理解为经济增长的容器,而是被期许为美好生活的载体、文化认同的场域、意义生产的共同体。

(作者系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以文铸城 以数启新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化与城市能级跃升的理论观察

要素的吸引力,日益取决于由制度环境、创新氛围与文化感召力共同构成的综合生态。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文化内容为核心,致力于打造具有高附加值、强渗透性的新型产品与服务,既直接贡献经济增长,更深度凝聚价值认同。

二是,文化资源实现从“静态保护”到“动态活化”的转型。数字技术有效平衡了商业价值和文化内涵,遂宁宋瓷博物馆将馆藏文物通过AI卡通形象、微短剧创作、节气文化短视频等形式,实现IP化运营,使千年瓷器从陈列展柜融入数字生活,这一过程,既是文化价值的释放,亦是文化生命的传承,数字化的文化资源正在成为城市参与新一轮文化竞争的独特筹码。

三是,城市品牌从“形象包装”走向“价值共鸣”。真正具有辨识度的城市品牌,必然生长于市民认同与外部感知的双向建构之中。遂宁DSD国风动漫嘉年华以“国风+二次元”的差异化定位,将非遗体验、手工工坊与传统节庆植入动漫展演场景,小众文化社群在互动参与中完成了对城市文化性格的集体书写,推进城市软实力实现从表层传播走向深层认同的关键跨越。

转化机制:圈层破壁重塑文化流量格局

遂宁经验最富改革辨识度的贡献,在于探索出一套将小众文化圈层转化为城市发展流量入口的完整机制。

科技赋能 让非遗活在当代

□ 李 燕

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浪潮下,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缺乏充足的展示空间与传播渠道,正面临着技艺断层、传播局限、产业薄弱等现实困境。而科技的崛起为濒危非遗的活化传承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本文积极探索适配当代语境的科技赋能非遗传承与推广的路径,以期为非遗在时代浪潮中守住根脉、焕发新机提供实践思路。

非遗传承的核心前提在于文化资源的完整留存,而传统留存方式易受自然侵蚀、人为损耗,难以实现长效保存与精准传递。标准化数字资源库的构建则为非遗资源提供了稳定、可复用的保存载体,非遗传承主体可利用高精度扫描、三维建模、4K影像录制等技术,全方位采集非遗工艺流程、代表性作品、传承人口述史等核心资源,捕捉技艺细节中的微妙手法,还原非遗作品的材质肌理与文化语境。此外,还应搭建加密存储与分级共享平台,在防范数字资源泄露与篡改的同时为传

承人、研究者、创作者提供差异化的资源获取渠道,让濒危非遗资源借助数字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代际间的精准传承。数字资源库还需持续迭代更新,动态化记录非遗技艺的演变轨迹,为非遗传承提供可追溯、可研究的完整数据支撑,筑牢传承根基。

借助VR、AR等视效技术重构非遗传播的场景维度,让受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针对传统展示模式中受众难以直观感受技艺流程的痛点,可通过VR技术构建虚拟体验场景,受众可在互动中理解技艺的核心要点与文化内涵;AR技术则能实现虚拟内容与现实场景的叠加,在非遗博物馆、古街古镇等线下空间为受众呈现非遗作品的历史演变、制作过程,丰富线下体验的层次感。沉浸式场景的开发并非单纯的技术堆砌,还需深度融合非遗文化内核,避免过度商业化与技术化稀释文化本质,无论是非遗民俗活动的虚拟复原还是传承人技艺的实时互动演示,都需以文化传递为核心,让受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非遗的文化温度。

融媒体传播矩阵凭借多平台、多形态、强互动的优势,成为非遗突破圈层限制、触达广泛受众的重要路径。非遗传承主体可整合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社交媒体、传统媒体及线下场景,构建“线上+线下”“大众+垂直”的全维度传播矩阵,实现非遗内容的立体化传播。线上端可借助短视频平台,打造非遗技艺短视频、传承人故事短片等轻量化内容,配合算法推荐触达年轻消费群体;通过直播平台开展非遗技艺展演、非遗产品品鉴等活动,以实时互动增强受众黏性。线下端则联动博物馆、文化馆、商圈等举办融媒体主题展览,实现线上内容与线下体验的联动呼应。同时还可将非遗内容融入文旅线路、文创产品中,借助多领域的流量优势扩大传播范围,让非遗突破地域、年龄、圈层限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破圈传播。

科技赋能下的产业转型能让非遗从文化资源转化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形态,形成“传承—创新—盈利—再传承”的良性循环。以国家级非遗苏绣为例,传承主体可

借助数字化建模技术与AI图案生成工具,设计出融合现代审美与国风元素的刺绣纹样,保留平针、缠针等核心针法,又满足当代消费者对于服饰、家居装饰品的个性化需求,同时通过直播电商、非遗体验馆线上云展等渠道,将绣品销往全国乃至海外市场,实现销售额的持续增长。此外,盈利所得的一部分可以用于建立青年传承人培养基地,以及邀请资深绣娘开展系统化教学,另一部分投入到刺绣技艺数字化存档项目中,为非遗的活态传承筑牢技术根基。

科技为非遗传承与推广提供了全新路径,但归根结底,非遗的核心生命力仍在于其文化本真与活态传承,技术只是赋能载体而非终极目的。未来在以科技推动非遗传承与推广过程中,需始终坚守“文化为核、技术为用”的底线,在创新表达中守护非遗的技艺精髓与文化寓意,让非遗在数字化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最终为文化自信提升与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强大支撑。

(作者单位:中共临沂市委党校)

□ 崔美英 金哲俊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认同、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符号,汉字以其独特的形意结合特性,不仅承载了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也在现代国际传播中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价值。汉字的现代影响力,已经从单纯的语言教育扩展到数字技术、创意产业、文化交流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多个层面,其作用和价值不容忽视。

汉字的独特优势在于其兼具视觉、语义和文化指向的特性。不同于拼音或字母文字,汉字通过结构、笔画和组合方式体现意义,承载了深厚的文化理念。例如,“仁”“礼”“和”“道”等核心概念,通过汉字形态本身,就传递了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哲学精神。这种符号化的文化传递,使汉字在跨文化交流中具备天然优势,学习者在认字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触和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这一优势并非自动转化为全球认同,汉字在国际传播中仍面临认知障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以及数字化学习局限等挑战。由此可见,汉字国际化的战略价值需要依托系统化的教育、技术 and 文化策略,而非仅依赖数量扩张或表面传播。

教育创新是提升汉字国际传播力的核心环节。近年来,全球汉语学习者已超过1亿人,遍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以及海外中文学校成为汉字传播的重要平台。然而,仅依靠课堂教学和数量增长,难以充分体现汉字在国际传播中的战略价值。真正的影响力在于教育模式的创新。沉浸式、体验式教学能够将汉字学习与历史、文化、艺术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习者在认知、实践、审美的多维度中理解汉字。例如,通过书法训练、文化研学活动、汉字创意设计等方式,学习者不仅掌握汉字书写,更体会到其承载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

数字化教育的兴起,为汉字国际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在线互动课程以及移动端教育平台,使学习者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汉字学习体验。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学习行为和偏好,可以实现个性化教学,提升传播效率和效果。数字化不仅拓宽了汉字教育的受众范围,也推动学习从单向接受向互动参与转变,使语言学习转化为文化理解。这种教育创新,为汉字在国际传播中塑造深度影响力提供了可持续的支撑。

在国际文化交流领域,汉字不仅是语言工具,更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随着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汉字逐渐成为国家形象和国际认知的重要符号。书法展览、国际汉字文化节、创意设计大赛等活动,使汉字在海外公众中获得广泛关注。通过这些平台,汉字不仅展示了视觉美感,也传递了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海外高校开设汉字文化课程,组织学生参与文化研讨与创作,将汉字体验与学术研究结合,形成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这种参与式、体验式的国际传播,使汉字的文化内涵不仅被认知,更被理解和接受,为中华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提供坚实基础。

现代创意产业为汉字提供了新的传播空间。影视、动画、游戏、广告及数字内容创作中,汉字被广泛应用并创新呈现。例如,一些国际影视作品中融入汉字场景设计或道具,不仅增加了文化层次,也增强了观众的文化认同感。数字游戏和虚拟世界中,汉字作为符号元素,丰富了视觉体验和文化互动。广告和品牌设计中,汉字艺术字体的运用,不仅传递信息,更彰显文化特色,提升国际市场辨识度。同时,数字短视频、表情包、互动内容中的汉字创新使用,使年轻群体在日常生活与娱乐中接触汉字,激发学习兴趣。这种跨界应用,将汉字的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创新产业相结合,使其现代价值更加直观可感。

汉字的国际传播不仅需要教育和创意产业的推动,更需要系统化策略。首先,在教育领域,应优化海外汉字课程设计,增强互动性和实践性,让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掌握汉字、理解文化内涵。其次,在技术应用方面,应推动人工智能、数字出版、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汉字传播中的使用,实现跨地域、跨语言的高效传播。再次,在文化推广方面,应组织国际汉字节、创意设计大赛、书法展览及文化主题体验活动,通过参与式体验让全球受众切身理解汉字的独特价值。同时,汉字国际传播应兼顾文化传承与现代创新,既保持传统魅力,又符合现代国际语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不可忽视的是,汉字的现代传播具有战略意义。它不仅关系到文化认同和教育推广,更涉及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在国际舞台上,汉字作为文化符号的可视化、可体验化特征,使其在塑造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和文化认同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系统化的传播和创新应用,汉字能够在全球文化环境中保持活力,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支撑。同时,这一过程也为全球多元文化互动提供了范例:在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汉字与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碰撞与融合,实现文化的动态交流与价值认同。

总之,汉字不仅是语言工具,更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在教育创新、科技应用、创意产业和跨文化传播的多维作用下,汉字在全球化时代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国际影响力。未来,汉字有望在提升中华文化全球认知度、增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强化国家软实力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通过持续推进教育创新、技术应用和文化推广,汉字的国际传播将更加系统化、可持续化,并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核心支撑力量。

【崔美英系吉林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硕士生导师;金哲俊系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汉籍译解文献集成与明清汉语史研究”(22&ZD305)成果】